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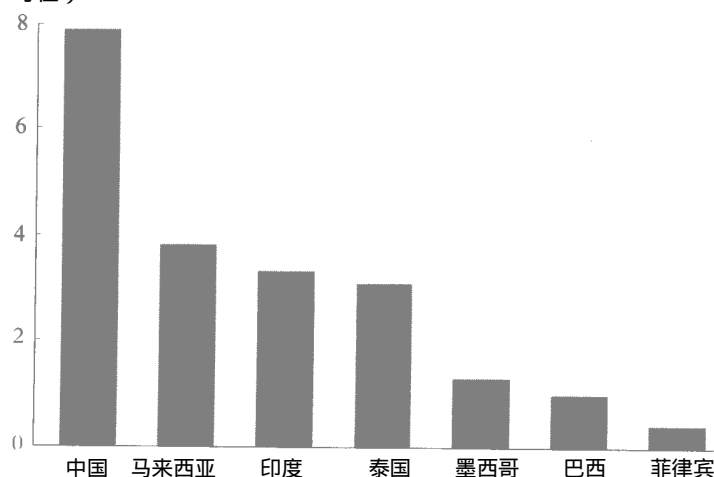
第一章 投资环境的重要性

在过去十年里，包括中国在内的主要发展中国家已开始更深入地融入全球经济。那些积极融入全球经济的国家，其经济增长速度明显要快于那些消极的国家。在 20 世纪 90 年代，全球化进程较快的发展中国家（按扩大的贸易参与度衡量）的平均增长率为 5%，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平均增长率却是 -1.1%^①。全球化进程较快的国家有巴西、中国、墨西哥、菲律宾、泰国和印度等。

总的来说，融入全球经济的发展中国家成绩斐然，这是一个好消息。但是平均水平掩盖了这些国家之间在发展成就上存在的巨大差别。中国的成就尤为突出，在这组国家里是无可争辩的领先者。在过去 20 年里，中国贸易额占 GDP 的比重已经实现了翻番（1999 年达到 GDP 的 41%），并且 1990—1999 年年均 GDP 一直保持着接近 8% 的增长率。马来西亚是另外一个优胜者：虽然亚洲金融危机导致其国民收入暂时下降，但在整个 20 世纪 90 年代，马来西亚仍然保持了年均 3.8% 的 GDP 增长率。同样，泰国也经历了亚洲金融危机，但它在 20 世纪 90 年代也保持了 3.8% 的年均 GDP 增长率。但是，另外一个积极参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国家巴西，在 1990—1999 年的年均 GDP 增长率仅为 1%，菲律宾为 0.4%。印度为 3%，在上述国家中处于中游水平（见图 1.1）。

图 1.1 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中国家的平均 GDP 增长率

（1990—1999 年的平均值）



① 在同一时期，发达国家的平均增长率为 2%。

这些差异的影响非常明显。如果持续 10 到 20 年，这样的增长差异将导致生活水平与贫困范围发生巨大变化。按照购买力平价法计算，中国与印度在 1990 年的人均 GDP 水平基本相当，约为 1400 美元。在此后的 10 年里，印度的人均收入翻了一番，而中国更是增加了两倍。因此，目前中国的人均收入比印度要高出 50%。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中国在减少贫困方面的进展也明显优于印度（见图 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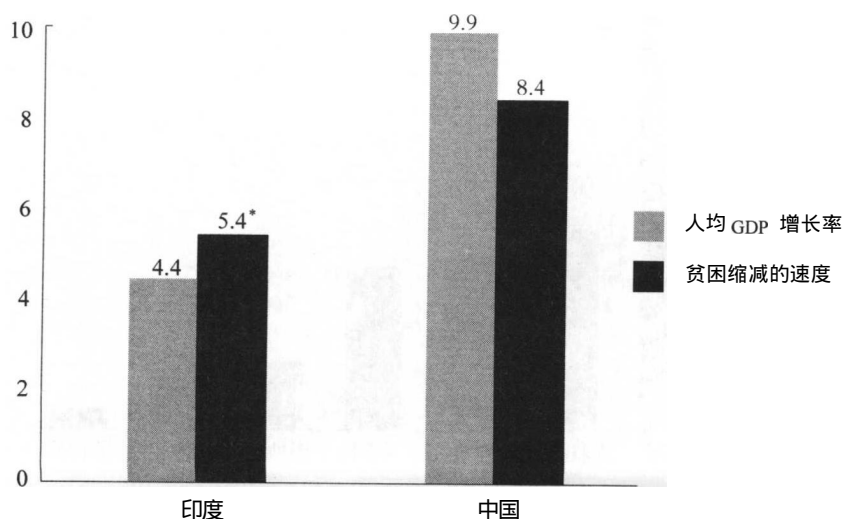
本报告的目的是研究各国在发展绩效上存在如此差异的原因。我们考察了中国的 23 个城市，而没有关注国家层面。之所以进行此种分析，主要是因为这些城市处在同样的法律、制度框架和宏观环境当中，从而可以减少一些关于企业绩效决定因素的错误推论。中国不同地区和城市之间的巨大差异，为描述企业绩效与投资环境之间的关联性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接下来我们将具体定义什么是投资环境。在第 2 部分，我们将简要评述投资环境对持续增长与减少贫困具有重要影响的一些宏观与微观证据。我们也会基于宏观（也就是说，国家层面）观察，对中国和其他国家的投资环境进行一个大体的比较。从总体上看，中国在宏观经济与政治稳定性、融入全球市场以及基础设施方面表现出色。充裕的廉价劳动力以及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迁移，已经并将继续成为中国的一种比较优势。但是，中国并非样样都很理想。金融部门的运行还缺乏效率，绝大部分的贷款贷给了国有企业，这些企业经常难以还贷，而中小企业不得不主要依靠自我积累和个人财富（或母公司融资）进行投资。此外，中国在教育水平方面也落后于相对发达的东亚邻国。

宏观描述虽然说明了投资环境的重要性，但并没有对投资环境哪些方面是重要的提出具体的指导，也难以判断在特定国家应采取何种特别的改革措施来改善投资环境。而且，其他

图 1.2 印度和中国的贫困减少状况和增长率密切相关

年百分比（1992—1998 年）



* 印度的贫困缩减数据是 1993—1999 年间的。

国家的微观证据也无法告诉我们哪些因素对中国企业是重要的。大家在读完本报告后将会看到，在不同制度安排、要素禀赋和技术条件的国家，投资环境对企业绩效的决定方式截然不同。因此，我们在第二、第三章专门针对中国进行了微观考察。我们的数据主要来源于世界银行和中国国家统计局企业调查总队的调查以及其他国家的相关数据和跨国数据库。

第二章介绍了中国的投资环境调查，第三章利用企业调查总队和世界银行对 3900 家企业的调查结果，对 23 个城市的投资环境进行了比较。第四章分析了投资环境是如何影响企业绩效的。

我们有几个主要的发现。

第一，23 个城市的投资环境有很大差异。我们描述的投资环境特征要素如下：基础设施，市场进入和退出壁垒，技能和技术禀赋，劳动力市场弹性，国际经济一体化，私有部门参与度，非正规支付，税收负担，法庭效率以及金融状况。根据调查结果，我们对 23 个城市在不同要素方面的表现进行了比较和排序。通过衡量每个城市改善投资环境（与理想城市的比较）的预期收益，我们给出了城市投资环境总的排序。“领跑者”（得分 A+）是杭州、上海、广州和深圳，它们都处于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紧随其后的城市的投资环境也很出色（A）：重庆、江门、长春和温州。获得 A- 的城市是天津、大连、北京和郑州。获得 B+ 的城市包括武汉、南昌、西安和长沙。获得 B 的城市是成都、贵阳、昆明和南宁。落在后面的一组城市（B-）包括哈尔滨、兰州和本溪。

第二，改善投资环境的潜力十分巨大。比如，我们假设在 100 个城市中，一个投资环境位居中游的城市如果跃居前 10% 的位置，它可以得到什么呢？估计企业的生产率会提高大约 45%，典型公司的投资率将从我们观察到的 14% 提高到 17%。这些具体的估算肯定会有一些不确定性，但通常来讲，企业的生产率、投资和增长与某些投资环境要素密切相关，改进本项研究所确定的那些不足之处可以大大改善企业绩效。

第三，在投资环境的要素分类当中，我们发现最重要的要素是进入和退出壁垒、技能和技术、外资参与度、劳动力市场弹性以及融资。私人所有权和税收负担并不像我们以前考虑的那么重要，但是仍然十分重要。相反，基础设施、法庭效率和非正式支付并没有表现出很强的约束，这或者是因为中国已经做得足够好了（比如基础设施，特别是在过去 5 年左右的时间里得到了极大改善），或者可能是因为一些要素目前尚难以发挥重要作用（比如法庭效率或者非正式支付）。

一、“投资环境”的概念界定

流向中国或任何特定地区资金的数量与质量，总是依赖于投资者对回报的预期以及在取得相应回报方面存在的不确定性。这些预期可归纳为下面宽泛的、但又互为联系的组成因素：

首先，是一系列关于经济、政治稳定以及国家外贸外资政策的宏观或国家层面的问题。这里，我们通常指的是宏观经济、财政、货币、汇率政策以及政治稳定性。就这些宏观指标

而言，中国运行得相当好，我们将在第二章中详细介绍这一情况。

第二，一国监管框架的有效性。就企业来说，它涉及有关市场进入与退出、劳动关系、劳动市场灵活性、金融与税收的效率与透明度以及与环境、安全、健康和其他合法权益有关的监管效率等问题。问题不在于到底需不需要监管，而是这些监管措施在设计上是否考虑到了激励，能否做到激励相容，能否避免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能否服务于公共利益，能否得到迅速执行而不会产生干扰和腐败，能否更容易地实现有效产出。虽然这些变量难以具体量度，但在我们的调查中还是清楚地反映了不同国家以及中国国内不同省（区、市）间监管有效性的差异。

第三，同样重要的是，可利用的基础设施和金融服务的数量和质量，诸如电力、交通、电讯、银行和金融；还有在熟练工人不能完全流动以及存在技术集群的情况下，技能与技术禀赋的状况。在问及企业家会碰到哪些问题或瓶颈时，他们常常提到基础设施的问题，如电力保障、运输时间和成本、融资渠道与效率以及缺乏熟练工人和难以获得先进技术，他们认为这些是决定企业竞争力与赢利能力的主要因素。

中国在 20 世纪 90 年代的成功表明，中国的投资环境呈现出许多积极因素。我们研究的目标之一是想弄清楚是什么促成了中国的成功，这将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有益的经验。相关证据也表明，中国的投资环境仍有很大的改善空间。可以确信，按照投资环境的首要指标（即宏观环境）衡量，中国已经相当优秀，因为中国的政治与宏观政策非常稳定。但中国经济结构的最新变化要求开展更深入的结构性改革。例如，加入 WTO 要求中国从基于自由裁量的治理体制（discretion-based governance system）转向基于规则（rule-based）的治理体制，这就要求减少政府对企业运作的干预。在融资方面，也应减少对特定所有制企业的偏爱。另外一个挑战是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迁移以及由于这种迁移和工人下岗（即国有企业裁减的工人）所带来的就业压力。这一挑战也要求进行监管制度的改革，以减少新企业、中小企业的进入障碍，因为新企业、中小企业已经成为创造就业的最重要力量之一。政府还应该推进金融改革，让中小企业更容易获得贷款。本报告希望能阐明在哪些领域进行进一步的改革能够取得较好的效果。

有两点需要说明。首先，我们对投资数量本身并没有兴趣。事实上，最近关于经济增长的研究（Easterly, 1999）表明，投资数量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联度出人意料地低。在很多情况下，这是由于扭曲的、运行不良的制度或政策环境所导致，致使公共和私人投资都未能产生本应产生的效益。因此，我们关注的不是投资数量，而是总体的制度与政策环境，即“投资环境”，它决定了投资能否创造出更强的企业竞争力和实现可持续的增长。

第二，我们承认社会基础设施与物质、金融基础设施具有同等的重要性，在定义投资环境时，我们没有考虑基础教育、卫生服务的供给问题。这是经过斟酌后才做出的选择。改善社会服务所需要的改革完全不同于我们这里讨论的基础设施和产业监管问题。

二、为什么投资环境很重要：宏观证据

受 Romer (1986) 与 Lucas (1986) 内生增长理论的推动，目前有大量的经验研究文献探索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一些实证结果相当稳健一致且颇具说服力，它们提供了投资环境重要性的宏观证据。例如，Fischer (1993) 发现高通胀是有损于增长的。在政府消费与增长之间具有明显的负相关性，这一结论最初是由 Easterly 和 Rebelo (1993) 提出的。毫无疑问，部分政府支出能够产生社会效益，但是那些政府支出很高的发展中国家，其官僚体系通常都缺乏效率且腐败严重。

大量的研究，尤其是最近 Frankel、Romer (1999) 以及 Dollar 和 Kraay (2001) 的研究发现，开放贸易与外国直接投资可以加速经济增长。这些发现带有新增长模型的思想，强调市场规模对创造更好的劳动分工以及更强的创新激励的重要性。除了宏观与贸易政策外，金融发展也是促进增长的催化剂 (Levine 等, 2000)。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具有发达的股票市场和银行系统的国家，其经济增长速度趋向于更高。

关于投资环境的一些量度，如产权保护力度、法治程度和腐败水平等，也与经济增长密切相关 (Kaufmann 等, 1999; Knack 和 Keefer 1995)。这些研究采用了从民营部门那里调查得到的数据，考虑了投资者与 (或) 企业对干扰、腐败、无效监管等问题的看法。然而，这些量度带来的一个问题是，这种调查经常是基于样本量较小的一组大企业进行的，对于作为经济支柱的中小企业如何受到法治状况和腐败水平的影响却没有提供具说服力的评估。

因此，跨国经验研究文献提供了证据，表明良好的投资环境能够促进增长和减少贫困。这里的投资环境指的是一揽子恰当的政策，其中包括适当的私人财产权、健全的法治、宏观经济稳定、合理的政府支出和全部集中于公共物品的供给以及开放对外贸易与投资。然而，这些研究使用的关于政策与投资环境的大多数宏观指标还相当粗糙，在帮助各国确定应该采取哪些措施来创造更好的投资环境方面作用有限。例如，从国别比较来看，目前中国与印度的宏观经济情况相似 (如根据取自不同来源的资料来衡量两国的法治状况、腐败水平、总体基础设施质量等) (世界银行, 2002)。两个国家的运行情况都比较好，因此都“适合”关于增长的经验研究。印度在 20 世纪 90 年代的增长率是经合组织 (OECD) 国家的两倍。然而，中国经济增长更快，减贫的力度也更大。宏观指标无法解释这些差异。因此，虽然这些宏观证据为我们进行进一步的研究提供了有用的背景和激励，我们还需要深入到更微观的层面，去调查大量的生产企业，包括中小企业，这样才能真正理解投资环境与增长之间存在的既丰富又微妙的关系。

三、投资环境的重要性：来自于投资环境调查的微观证据

世界银行在其他一些国家进行的企业调查，也证明了投资环境的重要性。特别值得指出

的是在巴基斯坦和印度进行的两次调查。这两个国家的调查表明，改善投资环境对企业绩效有着重要的积极影响。更重要的是，在这两个国家，决定投资环境的要素差别很大，正如我们将看到的，它们和中国的差别也很大。这说明为什么我们应该进行国别投资环境调查：目的是要发现各国投资环境的不足之处以及影响一个国家乃至一个国家内不同地区投资环境的关键要素。

通过对印度企业调查数据的深入分析，世界银行（2002）有一些重要发现。第一，印度在投资环境的诸多方面明显落后。具体说来，印度监管负担（用企业管理层同政府官员打交道的的时间所占的百分比来测算）沉重，基础设施恶劣。例如，在印度创办一家企业的平均天数为 90 天，但是在中国只需要 30 天。印度铺过的路面占 56%，但是中国的比例是 88%。印度每 1000 人有 3 台个人电脑，在中国是 12 台。印度的最大城市每 1000 人有电话 131 部，中国是 294 部。然而，在企业获得融资方面，印度的表现比中国要好。第二，印度企业增长的主要瓶颈在于劳动力市场的刚性（即很难调控企业的劳动力），监管的过度负担以及物质基础设施提供的严重无效率。他们的模拟发现：（i）以投资环境最好的州为标准减少企业的监管负担，那些在投资环境较差的州的企业平均销售率将年均提高 2%；（ii）以投资环境最好的州为标准改进能源供给和通讯服务，企业平均销售率将年均提高 3%。

除了政治稳定性、公共债务等宏观因素，巴基斯坦在很多投资环境要素方面都落后于中国。通过 12 个主要城市 9 个行业 965 家制造业企业的投资环境调查数据，世界银行研究人员（世界银行，2003）发现，投资环境存在的问题主要来自于基础设施供给、商业监管、税收和关税的管理、法律与秩序以及信贷市场功能的发挥。他们还发现，在控制了一些传统变量之后，巴基斯坦的生产率落后于印度 20%，而印度又落后于中国 20%。的确，将巴基斯坦的投资环境指标提高到中国的水平，可以使巴基斯坦公司的年均销售增长率提高 8.5 个百分点，净岗位创造率（用就业增长率测量）也将提高 3.1 个百分点。

印度和巴基斯坦的投资环境研究都表明，基础设施和商业监管是企业绩效的重要瓶颈。对印度来说，劳动力市场刚性有着独特的重要影响，然而对巴基斯坦来说，税收和关税管理、法律与秩序以及信贷市场也是重要的因素。因此，国别投资环境调查相当重要。我们不能简单地假设投资环境在不同的国家起着同样的作用。这正是我们对中国的投资环境调查经历了两轮并覆盖了 23 个城市的原因。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中国的投资环境瓶颈确实与上面提到的两个国家有很大不同。

四、中国投资环境宏观指标同其他国家的比较

把其他发展中国家同中国进行比较似乎已成为一种时尚。毫不奇怪，世界银行近期的几个出版物就将其他国家与中国的投资环境进行了比较（Dollar 和 Kraay, 2003；世界银行，2002, 2003）。这些研究表明，中国确实在很多重要方面做得相当好，但在其他方面则落后于一些东亚和东南亚邻国：

1. 正如前面与印度对比时所述，中国在基础设施方面做得相当不错。然而，这些数据也表明，中国在有些方面还落后于泰国，如电话普及率（294/1000 比 371/1000），电脑普及率（12/1000 比 23/1000），铺设道路百分比（88%对 97%）。

2. 在调查的 174 个国家中，中国在政治稳定性方面得分很高，政府有效性指标接近中间水平，但是在腐败方面低于样本国家的中间水平（Kaufman 等，1999）。中国的监管负担比印度和巴基斯坦要低。许多治理要素比其他一些国家要好。

3. 中国比印度的外贸开放程度更高。

4. 尽管高等教育的入学率较低，但总的来说，中国在人力资源和技能方面完全可以和其他东亚国家相媲美。然而，中国在研发投入方面落后于一些东亚邻国。比如，泰国将销售额的 5.6% 以上用于研发，而中国的比例仅仅是 2%。

5. 中国在市场准入和退出壁垒方面的表现较为复杂。不同的信息来源导致互相矛盾的一些发现。很多学者都很关心中国严重的地方保护主义。

6. 中国在为企业，特别是为中小（私有）企业提供融资方面表现尤其不佳。大部分信贷都提供给了国有企业，而私有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很难得到银行融资，而不得不依赖非正式渠道，比如家庭和朋友的借款、贸易信贷（即赊账）、母公司融资、或者未分配利润的自我积累获得资金。

上述发现为本报告后面的微观研究提供了一个有趣的背景。如果基础设施不再是瓶颈因素，它是否还会成为影响企业绩效的约束条件？如果融资是一个重要瓶颈，那么企业运行是否会受到融资的明显制约？进入和退出壁垒是否显著影响企业绩效？如果有证据表明技能和技术不是中国相对于其他东亚国家的比较优势，这些要素是否会妨碍企业绩效？本报告将围绕这些问题进行一些实证研究。

第二章 投资环境调查

鉴于投资环境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和减少贫困的重要性，世界银行在许多国家进行了一系列的投资环境调查。中国是最早实施这种调查的国家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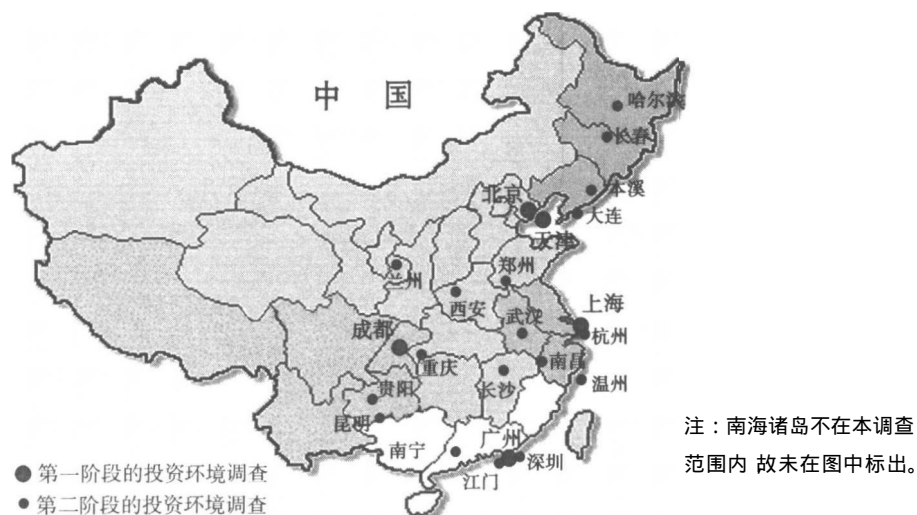
这项调查由中国国家统计局（NBS）的企业调查总队（ESO）与世界银行合作进行。第一阶段的投资环境调查于 2001 年进行，调查了中国的 5 个城市（北京、天津、上海、广州和成都）。在这 5 个城市中，每个城市都调查了 300 家企业，总计 1500 家企业。这项调查收集了企业的财务报表以及有关公司治理、融资、政企关系、创新、技术、劳动力等许多方面的详细信息。大多数定量问题涵盖了 1997 年到 2000 年这段时期，而大多数定性问题仅仅涉及了进行调查时的那个时点。后续的投资环境调查于 2002 年进行，抽样覆盖了同样的企业集合，其中有少数企业在两次调查之间已经消失。问卷内容包括：投资环境对公司的设立、基础设施和服务、融资、劳动力关系、销售和供给、政企关系、冲突裁决和法律环境、犯罪、生产能力、革新、创新和学习等方面的限制。

第一轮投资环境调查的样本包括制造业和服务业的企业。包括的产业有：服装和皮革制品制造业（14.1%）；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12.5%）；电子元器件制造业（14.7%）；日用电器制造业（11%）；车辆及其零部件制造业（14.4%）；信息技术服务业（8.9%）；通讯服务业（4.6%）；会计审计及非银行财务服务业（7.1%）；广告和市场调查业（5.8%）；商务后勤服务业（7%）。在样本内部，公司规模和所有权类型有充分的多样性。样本是在给定了城市、产业范围和规模层次以后随机抽取的。

中国的政策制定者和一般读者对第一阶段的投资环境调查报告反应热烈（David 等人，2003）。2002 年 12 月 3 日，中国财政部和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与世界银行在北京联合举办了一次会议来发布这一报告。最近，中国政府将投资环境的改善作为评价地方政府业绩的标准之一。比如，2003 年 6 月，在世界银行中文网站开通的第一个星期里，第一阶段投资环境报告的中文版就被下载了 344 次，在所有的论文和报告中排名第一。当我们在中国发布并宣讲此项研究结果时，也收到了不少来自读者的反馈。几乎所有人都希望我们再做一次调查，扩大调查的范围以覆盖更多的内陆城市。我们最初挑选的 5 个调查城市都处于经济发达地区，并不能很好地代表中国所有的省份。有人提出说，我们漏掉了投资环境的重要元素。例如，税率是公司投资的重要决定因素，但是第一阶段的投资环境调查没有对此进行全面关注。这些意见反馈激发了我们做另外一个调查的兴趣，也为我们重新设计调查问卷提供了很大帮助。

第二阶段的调查于 2003 年展开。我们选择了 18 个大、中城市，覆盖了沿海地区和欠发

图 2.1 中国 23 个城市投资环境调查地理位置



达的中西部地区（图 2.1）。在东北地区，我们选择了本溪、大连、长春和哈尔滨。在沿海地区，我们选择了杭州、温州、深圳和江门。在中部地区，我们选择了南昌、郑州、武汉和长沙。在西南地区，我们选择了南宁、贵阳、重庆和昆明。在西北部地区，我们选择了西安和兰州。我们在每一个城市选择了 100 到 150 家企业，总共调查了 2400 家企业。

在第二轮的调查中，我们特意从相同的 10 个制造业和服务业中随机进行了选择。但很多新选城市的规模还比较小，它们的产业分布和第一轮调查城市有很大不同。因此，对于一些城市来说，我们增加了（但是有限）更多的产业到样本当中。第二轮投资环境调查的产业分布如下（表 2.1）：

我们的投资环境抽样调查的一个特点在于，我们不是问一些依靠对问题理解的主观性问题，而是收集客观的数据资料。因此，我们问经理在遇到必要的监管时与政府官员打交道的的时间，而不是问繁文缛节是否是一个障碍。我们搜集有关企业临时工的比例和公司冗员程度的信息，而不是问劳动立法是否有限制作用。这些丰富的数据提供给我们 3 年多的信息，反映出跨时段业绩以及跨公司和跨地区投资环境的大量变化。

由于我们把两个阶段调查形成的数据库合并在一起，因此我们在解释结果时应注意以下事实：第一，第一阶段涵盖了 1998 年到 2000 年这段时期，而第二阶段涵盖了 2000 年到 2002 年，因此，我们用 1998 年到 2000 年北京、天津、上海、广州和成都的数据同 2000 年到 2002 年之间其他 18 个城市的数据进行比较。第二，有些问题只在第二轮调查中提出，而在第一轮调查中没有提出。这主要是因为我们在做第一轮调查时还没有认识到那些问题的重要性，第一轮报告发布后，搜集来的反馈信息才让我们加入了这些问题。

表 2.1 产业部门的频率分布：2003 年

部门	频率	%
服装和皮革生产	353	14.71
电子设备	185	7.71
电子零部件	276	11.50
家用电器	63	2.63
汽车和汽车零部件	358	14.92
信息技术	203	8.46
会计和非银行金融服务	157	6.54
广告和营销	154	6.42
商业服务	270	11.25
食品加工	71	2.96
化工和药品	66	2.75
生物技术产品和中药	36	1.50
冶金产品、制造业和工具	158	6.58
运输设备，包括		
通讯和轮船制造	50	2.08
总计	2400	100

资料来源：中国投资环境调查，2003年。

第三章 投资环境的地区差异

中国是一个有着多样性文化、饮食、地理和气候的大国，各地的投资环境也不同。在本章我们将阐述中国内部各地投资环境的差别，特别是我们已经调查过的 23 个城市。

中国的区域差异十分明显。总体上，东部沿海地区比中西部地区发展更为迅速，并能吸引更多的投资者。造成这种状况的因素有很多，例如自然资源禀赋、港口条件、居民的技术熟练程度、基础设施的数量及质量等方面的差别以及中国经济如何布局和政策如何制定等特殊因素。此外，初始的要素条件、决策的地区差异、税收安排以及其他许多因素的差别都能导致地区间投资环境的巨大差异。

我们将使用一系列涉及投资环境不同方面的指标而非单一的指标去衡量一个地方投资环境的优良程度。这种方法不仅突出了投资环境如何影响企业的复杂特性，而且强调了一个地区可以在一些方面超过另外一些地区，同时在另外一些方面又落后于其他一些地区。为方便讨论，我们把大量的指标分成 9 组。本报告最终所选用的指标，主要根据我们对企业绩效最重要影响因素的经验调查，同时参考了其他研究者的成果。实际上，我们已经把本文选用的指标限定在影响企业绩效的最重要的决定因素上。在关于投资环境的讨论中，我们把大量的指标分成以下几类：

1. 基础设施
2. 国内市场的进入和退出壁垒
3. 技能和技术禀赋
4. 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
5. 国际一体化
6. 私人部门参与
7. 非正常的支付
8. 税收负担
9. 司法效率
10. 金融状况

在本章的余下部分，我们将讨论如何着手测量上述的每一组因素，并据此分析 23 个城市在这些因素上的差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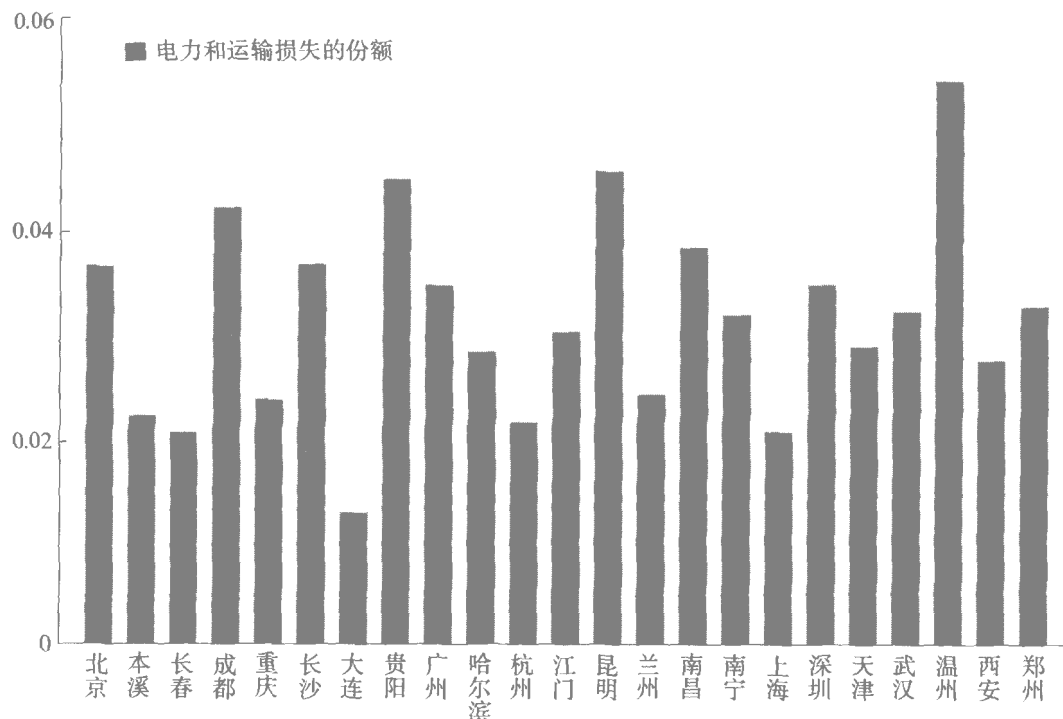
一、基础设施

基础设施是企业生产效率的重要决定因素。任何企业都依赖公路运出产品并输入原料。

它需要电信网络去与客户以及其他企业联系。燃气、电力和自来水都是企业生产所必须的投入品。很显然，基础设施的数量和质量构成了投资环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新企业愿意选择基础设施完善的地点，现有企业如果对某地的基础设施不满意将会选择搬迁到其他地方。然而，基础设施也相当昂贵，它多属于公共品范畴。例如，用于基础设施投资的份额约占社会总投资额的 20%，公共投资的 35%—55%。因此，基础设施是企业选址和生产效率的重要决定因素，因此也就成为一个好的投资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们通过计算电力的输电损耗、货物在运输中因偷窃和破损等所造成的损失（占总销售额）来测量基础设施的质量。^① 图 3.1 描述了我们所选城市的基础设施质量的差异。竖条代表了由于基础设施存在缺陷而造成的损失，较低的竖条说明基础设施质量较高。我们给每个城市一个从 A 到 C 的评级。用 + 或 - 表示差别的阴影部分，其中 + 表示稍好，- 表示较差。

图 3.1 城市间基础设施的比较



数据库分别给出了因电力中断和不稳定所造成的损失和货物运输过程中因偷窃和破损所增加的成本（占销售额的份额）。通过经验研究发现，它们的影响差不多。因此，为了论述简洁，我们把它们加总到一个变量中。我们也有其他一些基础设施的变量，例如安装电话的难易程度等。然而，在最初的调查中，我们发现这些变量并不构成企业运行的重要

评级结果如下：大连是惟一获得 A⁺ 的城市（1.2%）。有 6 个城市获得 A：长春和上海（2.0%），杭州（2.1%），本溪（2.2%），重庆（2.3%），兰州（2.4%）。4 个城市获得 B：江门，南宁，武汉，郑州，其百分比从 3% 到 3.2%。5 个城市属于 B⁻（3.4% 至 3.8%）：深圳，广州，北京，长沙，南昌。4 个城市获得 C（4.1% 至 5.3%）：成都，贵阳，昆明，温州。

必须清醒地看到，在我们的基础设施变量中没有包括诸如道路和港口的数量和质量、交通拥堵程度等其他重要成分。这些变量对衡量投资环境都很重要，特别在我们已经调查的如印度和巴基斯坦等国家中更是如此。在最开始对中国的经验调查中，我们发现它们并不是中国企业的重要瓶颈。这可能是由于过去 20 年间中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为这些基础设施部门进行大量投资，使它们得到了实质性改善。因此，我们看到这个结果的时候，头脑必须清醒。

二、国内市场的进入和退出壁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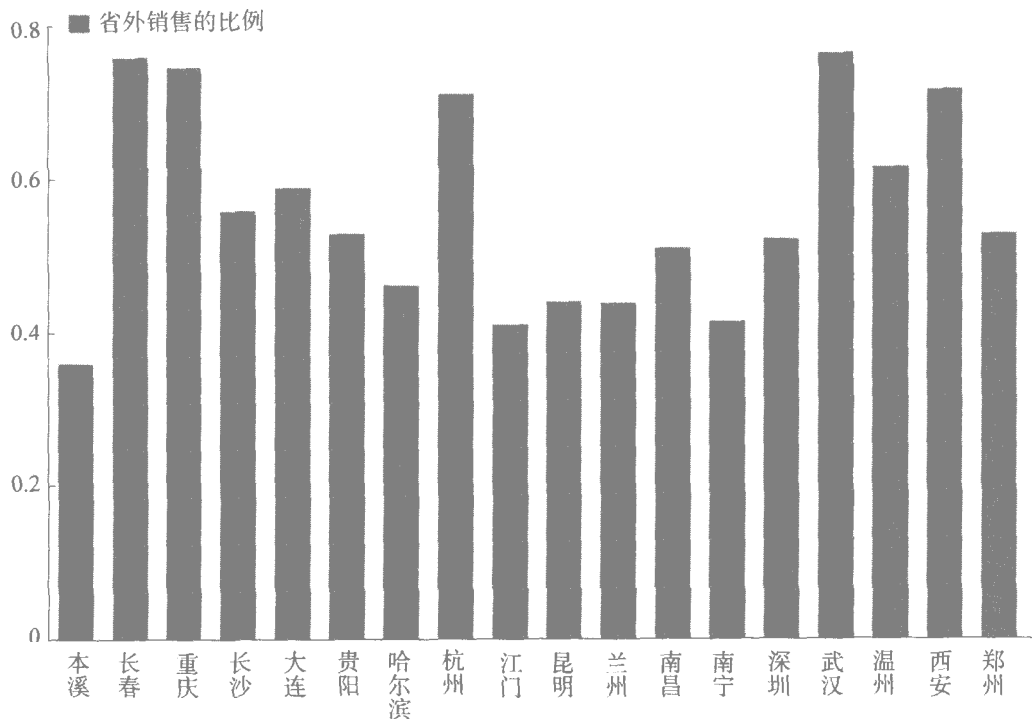
政策制定者和经济研究者都怀疑中国有很强大的国内市场进入和退出壁垒（参见 Poncet, 2002）。例如，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曾经成立了一个专门的小组研究这个问题，并在 2000 年出版了关于这个问题的专著（国家计委，2000）。世界银行中国局也正在从事一项关于地区保护主义的研究。很显然，进入和退出壁垒是投资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毕竟，潜在的投资者终究不喜欢在进入和退出壁垒高的地方投资。

我们用投资环境调查数据库对进入和退出壁垒做了两个测量。首先，我们知道一家公司的产品卖到外省的份额。我们把这个变量解释为其他省市对本企业所在省市设置的进入壁垒。^① 需要注意的是，这个变量并不代表企业所在省份的进入壁垒，但不管怎么说，它都是企业必须面对的进入壁垒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个测量只有第二次调查才有，所以我们没有北京、天津、广州、上海和成都的测量值。图 3.2 显示了 18 个城市平均的进入壁垒。

进入壁垒较低的企业所在城市（“A⁺”）是长春、武汉和重庆，这些城市的企业大概能够把它们产品的 75%—76% 卖到其他省市。进入壁垒得分为 A 的城市是杭州和西安，它们的企业能够把产品的 71% 卖到外省市。得分为 B⁺ 的是大连和温州，它们能够把产品的 59%—61% 卖到外省市。有 5 个城市得分为 B：长沙、贵阳、郑州、深圳、南昌，大概能卖出它们产品的 51%—56% 到外省市。得分为 B⁻ 的城市有哈尔滨、昆明和兰州，这些城市的企业能卖出它们产品的 44%—46% 到外省市。有 3 个城市（“C”）差距特别大，它们的企业只能卖出 36%—41% 的产品到外省市。3 个城市是本溪、江门和南宁。我们必须指出，这种排名是有局限性的。企业能把更多的产品卖到外省市可以解释为它们的产品更有竞争力，也可以解释为其他省市更好的市场可进入性。但是，本地公司的大部分产品都在本地销售还是可以作

另一种解释是这个变量代表企业的竞争力，而不是企业的进入壁垒。该数据并没有告诉我们哪一种解释更令人信服。

图 3.2 城市间市场广度比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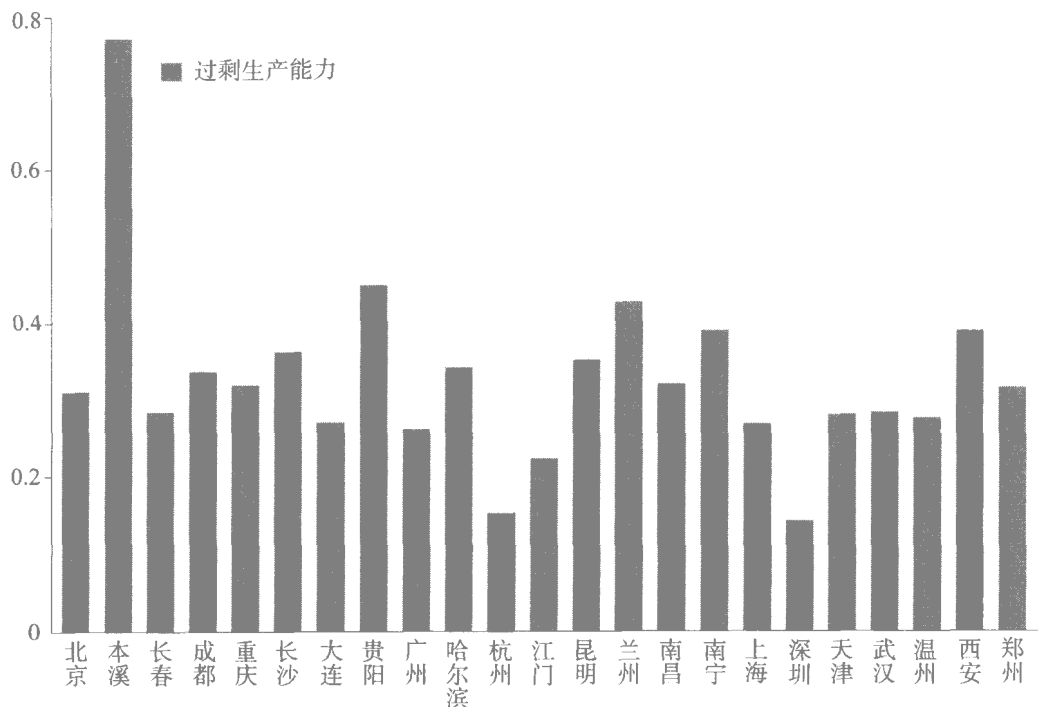
为显示地方保护主义的指标。

第二个测量是关于退出壁垒的，我们用企业的过剩生产能力来衡量。考虑到投资和雇用或解雇工人的调整成本，企业运行时总是保持着一定的过剩生产能力。然而，大量的过剩生产能力则意味着存在相当高的退出壁垒。图 3.3 描述了城市过剩生产能力的差异。

退出壁垒最低（“ A^+ ”）的城市是深圳（14.3%）和杭州（15.3%），接着是江门 22%（“ A ”）。 B^+ 定义为过剩生产能力为 27%—28%，获得 B^+ 的有 6 个城市，它们依次是大连、广州、温州、上海、武汉、天津和长春。 B 表示过剩生产能力在 30% 到 32% 之间，此类城市包括北京、郑州、南昌、重庆和成都。 B^- 表示过剩生产能力在 34% 到 39% 之间，它包括哈尔滨、昆明、长沙、西安和南宁。兰州和贵阳获得 C ，而获得 C^- 的本溪和 C 组城市还有不小的差距。

为了简单表示进入和退出壁垒，我们把这两个测度结合起来构造出一个加总的评级标准。由于只能获得参与第二轮调查的城市（second-round cities）的省外销售比例数据，我们需要一种基于可观测信息的方法来计算它们可能的得分。幸运的是，我们发现企业大小、市场份

图 3.3 城市间过剩生产能力的比较



额、企业年龄、城市人口和城市收入水平能够很好地描述这个标准。^① 因此我们有理由假设根据这个方法计算第一轮调查过的 5 个城市的变量值作为其实际的变量值。^② 现在，由于两个变量都有完整的观测值，我们可以通过主成分分析法（principal component method）把两个变量合成一个单一的指标。^③ 图 3.4 是计算的结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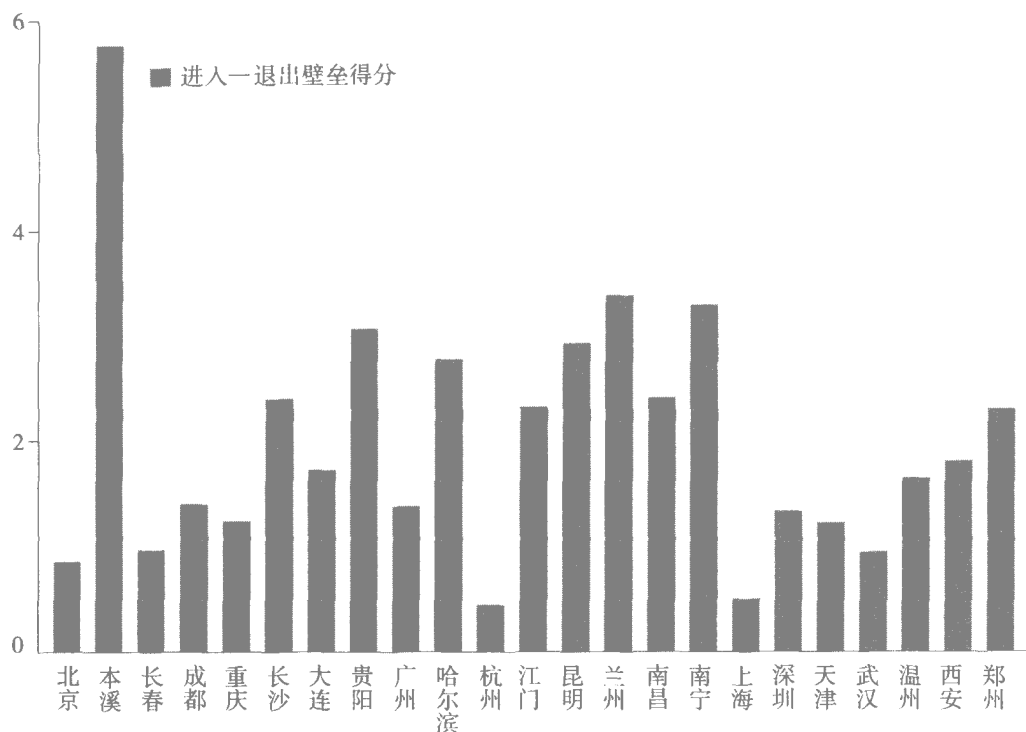
一般而言，富裕的城市看上去进入——退出壁垒更低。A+ 组城市中包括杭州和上海，这两个城市都处于长江三角洲经济中心区域。评级为 A 的城市包括北京、武汉和长春。获 B+ 的城市是天津、重庆、深圳、广州和成都。得分为 B 的城市是温州、大连、郑州、江门、长沙和南昌。得分为 B- 的城市有 3 个，哈尔滨、昆明和贵阳。最后，得分为 C 的城市包括南宁、兰州和本溪。

① 这些变量解释了因变量的 70% 的方差。

参 见 Greene 1990, pp. 288—289, 关于缺失观测值的处理方法。

其实，主成分分析法能发现那些密切相关的变量之间的线性组合，使得新构建的变量能够解释原始变量的大部分差异。此处两个变量的相关系数为 -0.44。

图 3.4 进入一退出得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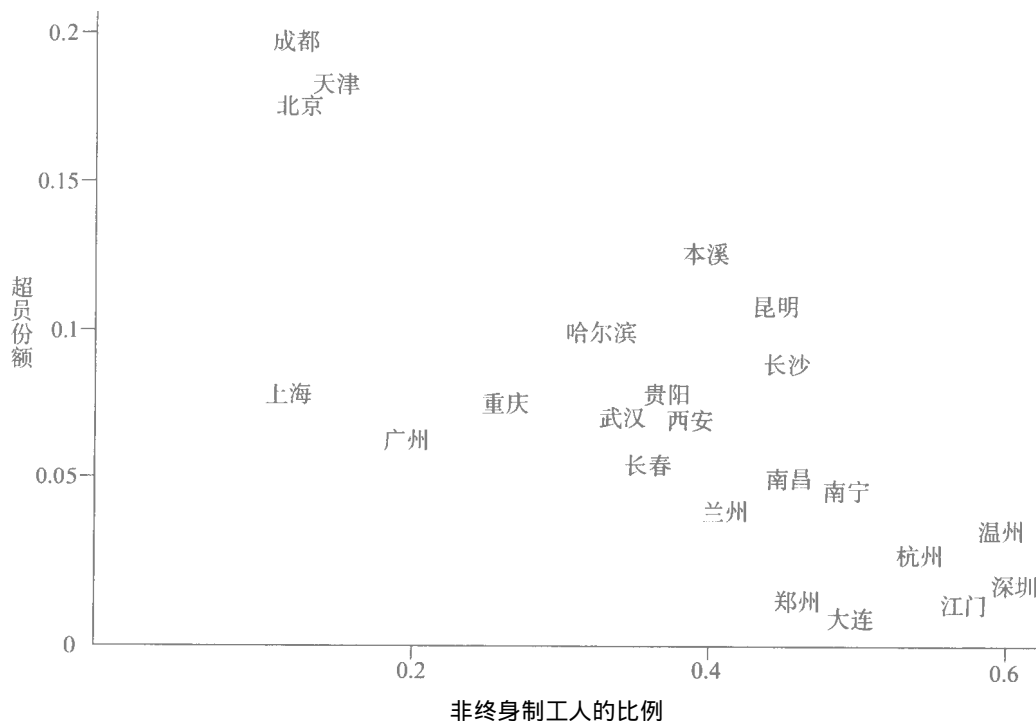
三、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

除了产品市场外，优良的投资环境还有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那就是有效的劳动力市场。一个健全的劳动力市场是用灵活性来刻画的，包括较低的退出壁垒。一个灵活的劳动力市场能够让工人和雇主实现有效的匹配。例如，如果雇员的劳动技能不能满足企业的需求或者雇员能找到一个收入更高（其他条件不变）的工作时，雇员和雇主最好能解除合同关系。尽管我们可以把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归入到进入一退出壁垒这个大类中，但是由于劳动力市场的这些特征极为重要，我们还是把它单独归为一类。劳动力市场的退出壁垒表现在许多方面，例如，不允许解雇工人的特殊要求，裁减冗员过程中的政府干预，严格限制雇用季节性或者合同制工人的法律法规，或企业为雇员提供保险、医疗保障和年金的要求等。投资环境调查用两种方法测量劳动的退出壁垒。第一个是非终身制工人的比例。由于裁减临时工和季节性

工人相对容易得多，所以一个更高的非终身制工人比例代表了更低的退出壁垒。^① 此外，在企业调查中，要求企业直接回答一个问题——如果它们解雇工人而不会被处罚，它们认为企业中冗员的比例有多大。因此，一个更灵活的劳动力市场可以用更高的非终身制劳动力比率和更低的冗员比率来刻画。

在图 3.5 中，我们画出了冗员比例和非终身制工人比例的散点图。首先需要重视的是，劳动力市场灵活性的两个方面是密切相关的。我们发现它们之间高度负相关：相关系数是 -0.77 。因此，我们完全可以把它们加总到一个单一的劳动力市场一体化指标中去。计算方法是 $-0.71 \times \text{冗员比率} + 0.71 \times \text{非终身制工人比率}$ （图 3.6）。^② 需要注意的是第一轮调查的 5 个城市的得分是所有样本中最低的，我们怀疑那是因为劳动力市场改革很快，以至于这 5 个城市的劳动力市场在 1998—2000 年间的情况确实比其他城市在 2001—2002 年间的情况差。

图 3.5 城市间劳动力市场政策的比较



在一些情况下，大量依靠非终身制劳动力确实能够反映某地方较高的退出壁垒（也就是说，企业雇用大量的临时工能够避免法律规定的一些负担）。但我们认为考虑到中国劳动力迁移和定居的需求，允许雇用临时工实际上是劳动力市场更加开放和更具灵活性的标志。

^② 这是两个变量的主成分指数，这个指数包含了两个变量中的主要变化。